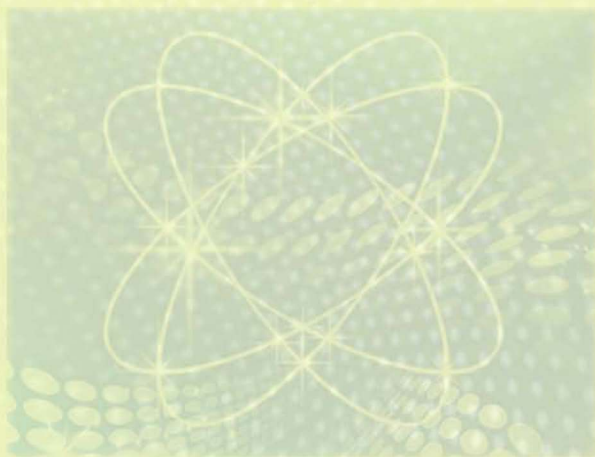


知识考古学与十七年小说研究

刘成才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文学研究丛书

WENXUE YANJIU CONGSHU



知识考古学与 十七年小说研究

刘成才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知识考古学与十七年小说研究 / 刘成才著. — 北京 :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117-3064-0

I. ①知… II. ①刘…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81566 号

知识考古学与十七年小说研究

出 版 人 : 葛海彦

出版统筹 : 贾宇琰

责任编辑 : 曲建文

责任印制 : 尹 珺

出版发行 :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41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 (010) 66515838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 264 千字

印 张 : 15.25

版 次 : 201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45.00 元

网 址 : www.cctphome.com 邮 箱 :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 @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 cctphome)

淘宝店铺 :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2612349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 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敬伟 问小牛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 (010) 66509618

目 录

绪论 十七年小说的文学社会主义想象·····	1
第一节 重新进入十七年小说的难度与困境 ·····	1
第二节 十七年小说与当代中国的意义扭结 ·····	4
第三节 重建十七年小说与时代的精神关联 ·····	8
第一章 十七年小说的主体询唤与文学重构·····	14
第一节 时代语境转换与十七年小说转型 ·····	14
第二节 青年作家的想象性叙述与话语分裂 ·····	24
第三节 老作家的人间情怀与介入意识 ·····	36
第四节 家国话语与女性主体想象 ·····	48
第二章 十七年小说的主体想象与知识生产·····	65
第一节 十七年小说中知识分子的主体想象 ·····	65
第二节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真实与规训之间的张力性书写 ·····	73
第三节 政治主体想象与文学的互文性书写 ·····	82
第四节 “萧也牧创作倾向”的发生学与政治卫生学 ·····	90
第三章 主体构建与十七年小说作为方法·····	102
第一节 “锈损了灵魂的悲剧”与“优选者”的承担意识 ·····	102
第二节 理想王国的梦幻写作：论十七年农业合作化小说 ·····	113
第三节 十七年小说的生活化政治与型塑新人 ·····	127
第四节 困顿中的退守与坚持：论十七年的路翎小说 ·····	135
第四章 主体重述与十七年小说的叙事伦理·····	142
第一节 “儿女情”与“迷惑力”：十七年小说的规训机制 ·····	142

第二节 “1962，你不选英雄事迹”：十七年小说的生产与增殖…… 152

第三节 十七年小说的上海书写及其主体重构 …… 159

第四节 赵树理的十七年小说及其现代性悖论 …… 167

第五章 作为一种传统的十七年小说及其当时代关联…… 178

第一节 日本学者“赵树理研究”的生命情怀与方法论意义 …… 179

第二节 作为一种资源的十七年小说：《人生》的知识社会学解读 …… 192

第三节 作为传统的十七年小说与后现代主义批判性知识生产 …… 200

第四节 重述中国主体：“崛起”与“文化自觉”的中国 …… 212

结束语 重建十七年小说与当代中国的精神关联…… 220

本书涉及的十七年小说主要篇目…… 224

参考文献…… 230

后 记…… 239

绪论 十七年小说的文学社会主义想象

第一节 重新进入十七年小说的难度与困境

十七年小说作为特殊年代的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是一种尴尬的文学存在，因为和政治的关系太过于紧密，十七年小说便被判定为伪文学，因此被经典化或者入选各种权威文学史的也就只能是极少数。最典型的如王晓明编选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有一个作品附录，在这个“表达遍选者所持有的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看法”的作品年表中收录了他认为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最重要的83部作品，十七年小说仅有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和柳青的《创业史》这两部（篇）^①，相对于整个十七年小说来说，篇目上少得可怜。

在众多类似的话语逻辑中，研究者把十七年小说断定为中断了自五四文学开始的现代化进程，而新时期文学则接续了中断了的五四文学的现代化传统，使文学摆脱了政治的束缚回到了自身，甚至认为是“回到了五四”。在这种话语逻辑下，十七年小说当然地被逐出了当代文学史的经典化过程。这种新的“断裂论”试图把历史划分为相互之间没有一点联系的独立片段与完全可知的部分，但是，如果在文本之外真的存在着一个真实的历史的话，那么，这个历史“真实”也肯定不会是单独存在的，而只能处于一个不断混杂的过程之中，因为，“如果我们确实是这样或那样的混杂物，那么，那些假设的过去与现在、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断裂就仅仅只是现代主义的一种特别的虚构”。^②

更困难的是，这种“断裂论”的话语逻辑给十七年小说研究带来一个无法

① 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464-468页。

② [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页。

突破的困境，正如李杨指出的那样，它“使得在政治运动频仍的‘十七年’没得到相应研究的‘十七年文学’，在‘文革’后也缺乏相应的研究成果；更为不堪的是，这项研究在一些人看来，甚至有为‘错误的年代’和‘极左政治’翻案之嫌”^①。李杨就曾在研究中揭示新时期文学与50—70年代文学之间的内在话语逻辑联系，质疑“断裂论”^②，主张对十七年文学重新评价，强调十七年文学的文学史价值，提倡把“知识考古学”作为十七年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方式：“尝试以知识考古学作为当代文学史的一种写作方式，意味着我们将拆解那个已经进入我们潜意识的、其实完全受控于我们当下价值标准的文学/非文学的二元对立认知方法，我们的研究对象将不再是那些以今天的观点看来是‘真实’的文学作品，而是那些在当时被称为‘文学’与‘经典’的文学作品”^③。但由于文学研究界的“势大于人”^④，这一观念在学界只是“吹皱一池春水”，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1990年以来，由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者肇始的“再解读”思潮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风行，“再解读”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所谓“再解读”，即“把文学作品放到更为复杂的历史语境和文化建构过程之中，探讨它在社会文化中的位置、它如何与更大的历史话语建立起联系、如何‘象征性’地呈现特定历史情境中的文化逻辑和文化理念”^⑤。由于“再解读”研究的对象是单篇作品，方法上用的是“小题大做，举例说明”，目的是证明我们惯用的对文学的历史叙述都是被某种“权力”建构起来的，虽然具有“反历史”的色彩，但是即便我们将那些个案分析聚拢在一起也不会自行构成历史叙述。这种碎片化的历史建构对“再解读”的实践者来说显然是一个遗憾，并且也

① 董之林：《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1949—1966）》，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243页。

② 李杨：《没有“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何来“新时期文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

③ 李杨：《当代文学史写作——原则、方法与可能性》，《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

④ 黄修己：“‘势’即客观的局势，‘人’指研究者。‘势大于人’是说现代文学史面貌的改变，主要不是由研究者通过学术研究达到的，而是客观局势的变化，像无形却握有巨大权力之手，左右着研究者的思想，使人们的价值取向、评价标准变了，随之对现代文学史的看法也变了。人们陶醉在自以为的学术创新的喜悦中，哪知其实是时势之手拨转人们的视线，使其有了观察的新尺度。”《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势大于人”》，《东方文化》2002年第5期。

⑤ 贺桂梅：《“再解读”——文本分析和历史解构》，《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引发了他们的反思。^①

1999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试图摆脱单一的以政治为标准的评价方式,“努力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强调“历史的现场感”和“触摸历史”效果,认为“50~70年代的文学,是‘五四’诞生和孕育的充满浪漫情怀的知识者所做出的选择,它与‘五四’新文学的精神,应该说具有一种层的延续性”^②。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尝试的就是“价值中立”的“知识考古学立场”,“在文学批评中,我们越来越多采用一种‘历史批判方法’。即不把任何概念、现象看作是‘本质化’的、‘终极化’的概念、现象,而是看作历史性的范畴。我们的关注点,已经从被确定为‘事实’的事实的分析,转移到对这种事实为何被确定的分析。这就像批评家特雷西所说‘历史批判方法向我们提示:那些被作为事实陈述的事实,是如何成为事实的’”^③。但他同时也指出:“我在《文学史》中讲到的对价值判断的搁置与抑制,并不是说历史叙述可以完全离开价值尺度,而是针对那种‘将创作与文学问题从特定的历史情景中抽出来,按照编写者所信奉的价值尺度作出臧否’的方式。”^④这显示了他的谨慎态度。洪子诚在后续出版的讲课稿《问题与方法》中更是用“知识考古学”与“谱系学”的方法,对“文学史意识”、“文学与历史”、“文学史与叙述”、“历史记忆”、“左翼文学”等一系列主流文学观念中不证自明的理论预设的质疑和追问,重新建立这些词语、主张和“语境”之间的关联,辨析它们特定的内涵。这两本以知识考古学为理论基础的文学史著作作为当代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空间,并为十七年小说研究提供了“范式转换”^⑤的典范。

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则以十七年作家作品偏离意识形态的程度来确定其文学价值,其对潜在写作的挖掘提升了潜在写作的文学地位,使

① 唐小兵、黄子平、李杨、贺桂梅:《文化理论与经典重读》,《文艺争鸣》2007年第8期。

② 洪子诚:《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

③ 洪子诚:《问题的批评》,见幺书仪、洪子诚:《两意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页。

④ 李杨、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⑤ 范式指的是在某一学科内被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包括认识事物的模型、模式、理论等。范式的形成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由一种常规科学发展为另一种新的常规科学,就是范式的转换过程。“科学革命”的实质,就是“范式转换”。[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潜在写作成了十七年文学的高地，认为这些作品“真实地表达了他们对时代的感受和思考的声音。这些文字比当时公开发表的作品更加真实和美丽，因此，从今天看来也更加具有文学史的价值”^①。在这一原则下，胡风、牛汉、曾卓、绿原、穆旦、唐湜、彭燕郊的诗，张中晓、丰子恺的散文，以及黄翔、食指、岳重、多多的诗，赵振开的小说，等等，大规模地进入当代文学史，极大地改变了当代文学史的地理构成。但是，这种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当代文学研究中“文学史焦虑”的表征：“对 50—70 年代，我们总有寻找‘异端’声音的冲动，来支持我们关于这段文学并不是完全单一、苍白的想象”^②。对于这种缓解“文学史焦虑”的行为与努力，在诗人廖亦武的理解中，近似一种“操作历史”的行为：“同作品相比，围绕着作品，最终偏离作品，直指历史和现实地位的后现代爆炒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诗人被这种市场经济中的成名规则熏陶成了从媚俗到领导时尚的阴谋家”^③。

于是，重新进入十七年小说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悖论：我们不得不借用研究者既有的概念来讲述十七年小说历史，这些概念构成我们理解十七年小说的基点；但是，一旦我们使用这些概念去理解十七年小说的时候，这些概念背后所隐藏的简单化的历史叙述却无法揭示其中掩盖和压抑的多元性、差异性和增殖性。于是，在这种悖反境遇下，十七年小说成了一个永远无法言说自己的“大他者”^④。

第二节 十七年小说与当代中国的意义扭结

重新进入十七年小说，之所以会面临这些难度与困境，与十七年小说和政

①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 页。

②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78 页。

③ 廖亦武：《操作历史》，《读书》1996 年第 11 期。

④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43 页。

治以及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紧密勾连有很大的关系。

浏览各种版本的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史和文学思潮史，会发现大大小小的文艺批评运动充斥其间，各类批评文章支撑着中国当代文学史、文艺思潮史关于十七年小说的历史叙述。但是，文学史只是关于十七年小说的一种叙述，不是十七年小说现场的真实记录，各种版本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对我们认识那段文学的真实状况只能是一个参照，因为在文学史的写作中，有一种简化的思潮支配着我们对文学的理解与认识，正如昆德拉所担忧的：“简化的蛀虫一直以来就在啃噬着人类的生活；即使最伟大的爱情最后也会被简化为一个由淡淡的回忆组成的骨架。现代社会的特点可怕地强化了这一不幸的过程……人类处于一个真正简化的漩涡之中，其中，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彻底地黯淡了，存在最终落入遗忘之中”^①。在这种“简化蛀虫”的啃噬之下，研究者强行征用一种形而上学的“减法”，消减掉十七年小说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把纷繁芜杂的十七年小说简化为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这种形而上学的“减法”也成为我们认识十七年文学真实面貌的巨大障碍。

我们对待历史最常用的思维就是把生动具体的历史现场简化为对一种对历史的叙述，并把这种简化了的叙述当作历史本身去加以接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往往忘记“抽象往往是话语霸权的帮凶，因为它可以通过语焉不详把话语的危险性降到最低而把它的威慑力提到最高……它最常见的形态，就是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中直接应用某些被人普遍接受因而不会加以质疑的结论”^②。因此，重新进入十七年小说研究，首先要警惕的就是这种抽象话语把十七年小说抽象为简单的政治附属物，以防这种抽象话语阻碍我们对十七年小说的理解。

不可否认，十七年小说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运动频仍的特殊年代，通过一系列的批评运动，大批小说被逐出了历史讲述的话语场所，众多作家被剔除了话语讲述资格。十七年小说不但承载了十七年时期文学的无上荣光，同时也承受了责难。在这一过程中，十七年小说充满了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扭结，可以说是现实对知识分子规训的典型文本呈现。但由于政治规训主要采取的是内在方式，即葛兰

① [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3页。

② 孙歌：《在理论思考与现实行动之间》，《读书》2000年第11期。

西所说的“认同”^①，这种“认同”并不取决于“事实”，而取决于“建构”，即通过言说和语言的运作，通过记忆和遗忘的选择，让外在的知识、思想、意识形态与政治转化为内在的要求。透过十七年小说这种复杂扭结的文学文本，我们可以看到现实的意识形态话语在作家的独立人格与意识上投下了怎样的斑驳阴影。

随着历史的转折，十七年小说在新时期由“毒草”成了“重放的鲜花”^②。这种重评观念的变化，纯文学的信奉者倾向于理解为文学或文学史的自觉，知识考古学视域中看到的却是主宰文学史写作的主流历史观念及现实政治发生了变化。在新的现实政治面前，文学史写作面临着德里克所谓的“范式危机”，既有的“革命范式”已经不能再继续阐释十七年小说，新的“现代化范式”的出现改变了“革命范式”支配十七年小说研究的局面，出现了“历史研究丧失了中心”的局面。^③在变化了的时代面前，现代化史学观念通过“他者”重新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这种‘范式’与旧‘范式’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更主要是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待、分析中国近代史，而不把中国近代史视为仅仅是一场‘革命史’”^④。

可以看出，搭建起对十七年小说的文学史讲述框架的，依旧是主宰文学史话语的二元对立的内在逻辑思维模式。德里达认为这种二元对立模式可以追溯到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即理性中心主义传统，它的理论基础是创造出一系列的二元对立概念，如“语言/文字”、“意义/形式”、“真理/谬误”等诸多对立的观念，并赋予其中一方以统治与优先地位，另一方则处于被统治的地位，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等级制度，或者说是一种话语霸权。研究者在中研究中所要避免的，正是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对自己的限制。对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解构，在德里达看来就是摆脱“权力”对自己的控制，“解构不是一种简单的理论姿态，它是一种介入伦理及政治转型的姿态，因此也是去转变一种存在霸权的情境，自然这也等于去转移霸权，去叛逆霸权并质疑权威。从这个角

① [意] 安东尼奥·葛兰西：《文化与意识形态霸权》，J.C. Alexander and S. Seidman 编：《文化与社会》，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47。

②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重放的鲜花》，上海文艺出版社 1979 年版。

③ [美] 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吴静研译，《中国社会科学辑刊》1995 年春季卷，第 135-141 页。

④ 雷颐：《总序——为了前瞻的回顾》，冯林主编：《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改革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 页。

度讲，解构一直都是对非正当的教条、权威与霸权的对抗”^①。

因此，在研究十七年小说时要坚持“永远历史化”的原则，把它放置到共和国特定的社会政治历史语境中去加以理解，考察它与十七年文化政治的内在关联。即使是十七年小说中与政治联系比较紧密的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也不能因其写作动机而忽视其在写作过程中的流转与变异，而简单化地一律贬斥为作者对现实迎合的虚伪心态。因为“一旦作家开始动笔，作品中出现了人物，一旦这些人物按照作家的意志获得了生命，他们就会开始对提纲提出异议，与提纲做起对来，作品开始按其本身的内在逻辑展开”^②，我们所要面对的就是独立的小说存在，而“当小说中发生的一切让我们感觉这是根据小说内部结构的运行而不是外部某个意志的强加命令发生的，我们越是觉得小说独立了，它的说服力就越大。当一部小说给我们的印象是它已经自给自足，已经从真正的现实里解放出来，自身已经包含存在所需要的一切的时候，那它就已经拥有了最大的说服力”^③。即便是在十七年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全方面监视与规训所起到的效果也不可一概而论。就意识形态本身而言，它并不完全取决于某一领导的个人意愿，而必须在一定的社会和历史环境的双重作用下，成为一种普遍的、具有约定俗成的日常生活惯性，才有可能变成对公众社会具有导向性和约束性的力量。

我们如果以这样的心态深入去看农业合作化小说，就会发现作家对生活与艺术的态度是真诚的。因为写农业合作化小说的作家所追求的不是与生活同步，而是要把一种理想化的生活合乎情理地表现出来，这恰恰印证了亚里士多德“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一桩不可能发生而成为可信的事，比一桩可能发生而不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更为可取”^④这一伟大而古老的断言。作家们用小说描写农业合作化，是对一种理想生活方式的追求，因为小说存在的意义就是对应然生活的追寻，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并非已经发生

① [法]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页。

② [俄]康·帕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戴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

③ [秘鲁]马里奥·略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赵德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④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0页。

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得出来的。小说家画出存在地图，从而发现这样或那样一种人类可能性”^①。

由此可以看出，一旦我们进入十七年小说与十七年社会政治意义的扭结之处，便会发现，十七年小说的具体描写往往“服从于一个煽动不断增大的机制”，而知识生产却是一个不断增殖的过程，各种作用于十七年小说的“权力技术没有屈从于一个严格挑选的原则，而是服从于一个多元形式的撒播和移植的原则”^②。因此，解开十七年小说与十七年社会政治意义扭结的关键在于，运用“知识考古学”与“谱系学”的方法，通过对十七年小说的具体分析，探索它们得以生成的条件，寻找它们“被组装起来的各种规则是什么”^③。对十七年小说来说，这种研究可能更为可观，也更有意义。

因此，我们对十七年小说要抱持“了解之同情”的研究态度，即陈寅恪所说的：“历史研究对于前人之情境与心态，必须有一份‘同情之了解’”，“所谓真了解，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④，以及钱穆意义上的：“所谓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而将我们自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⑤。唯有如此，才能最大程度地探究十七年小说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如何参与到国家主体建构中去的这一知识增殖的过程。

第三节 重建十七年小说与时代的精神关联

我在研究中尝试进入十七年小说的途径是重返十七年小说现场。提倡重返十七年小说现场，并不是通过这种重返去判定不同小说文本及文学观念之间的高

① [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

② [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余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0页。

③ [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余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0页。

④ 《陈寅恪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5页。

⑤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页。

低之分，做文学价值的裁决者，而是通过这种重返试图努力找出各种思想价值体系的规律和历史脉络及它们背后的“权力”运作。因为对聚讼纷纭的十七年小说研究而言，只有当我们的研究超越了传统的二元对立关系造成的视野局限，研究的进展才会成为可能，才能“通过‘重返’文学史‘现场’，进一步了解当代文学生产的社会背景、氛围和情绪，跨越那些覆盖在文学史表面的夸张的修辞，从而对当时文学创作的真实状况获得一个比较客观的和大致准确的认识”^①。

文学作品必然会受到社会政治环境的制约与影响，这是文学史家的共识。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非常准确地指出了社会政治环境与时代对中国小说的影响：“光绪庚子（1900）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幡然思改革，凭敌愆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政变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②。美国小说理论家伊恩·瓦特在研究小说的起源时，则倾向于认为小说的出现与兴起与18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兴起后社会经济状况发展到一定程度有密切的关系。经济的发展与中产阶级的崛起给人们的生活以足够的闲暇时间，但是“中等阶级的妇女几乎没有可能参加她们的男人的活动，无论是商业方面的，还是娱乐方面的。对她们来说，参与政治、商业活动或她们的财产管理都是偶尔为之，主要的男性业余活动，诸如狩猎、宴饮等，也都把她们排斥在外。因此，女人就有了充分的闲暇时间，这些闲暇通常就被博览群书占用了”^③。伊恩·瓦特认为这种社会氛围是小说在18世纪兴起的主要原因，而且正是由于女性读者群潜在的接受与消费导引，所以当时小说弥漫着罗曼斯的艺术氛围。同理，作为特定时代的文学，十七年小说受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自然是再正常不过的。

所以，我在研究中对十七年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比较注重，目的在于阐述十七年小说中那些容易被忽视的与历史互相纠缠的细节，摆脱研究中惯用的

① 程光炜：《重评“伤痕文学”》，《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

② 《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34页。

③ [美]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高原、董红钧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42页。

那种简单化的庸俗社会学结论。文学的发生与知识的生产是由各种复杂因素互相作用促成的，决定的因素绝不可能是单一的，因此，影响十七年小说的不同因素都将在我的研究中凸显，相互之间形成一种特定的联系。透过小说文本与周边政治文化的关系的辨析，尝试去定位这些小说文本对当时的文学规范究竟偏离到什么程度，在什么点上偏离了当时的规范。比如，在分析路翎的十七年小说创作在当时被疏离的状态时，通过对小说《洼地上的“战役”》的分析，我将力图去准确地定位它在什么地方偏离了当时规范的叙述，它在哪些地方引起谴责和批评？并由此带出路翎在十七年的其他小说，去探究十七年时期路翎在困顿中的退守与执着，而不是把这些小说笼统地放置在当时肯定的那些作品的对立面上。研究中将努力做到“致力于还原历史情境，通过这种‘文本的语境化’与‘语境的文本化’，努力使文学研究转变为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平等对话”^①，解开十七年小说与现实的复杂纠葛。

为了解十七年小说与政治之间的互文性，我在解读这些小说文本时充分重视“富有成效的扭曲”的痕迹。这就要求我不能仅仅把目光只放在对整体的关注上，还要把研究重心放在小说与社会政治环境关系的探讨上。与此同时，高度关注小说文本中所呈现出的具体而富蕴生动性的细节，关注这些细节对整体的意义及其言说方式的呈现。过去的研究更多把焦点放在政治运动、风云人物、阶级斗争等宏大历史叙事中，而“斑斓的历史恰恰是由丰富的细节所构成的，对细节的忽视就不可能显示出生活的全貌。历史是鲜活的生活，但是生活却往往淹没在大事件的影子背后”^②。因此，对细节的关注，能够让历史变得丰富与生动。

十七年小说中以“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为代表的宏大历史叙事承载了几代人的光荣与梦想、泪水与辉煌。经过几代人的阅读，这些小说已经逐渐经典化并进而融化在人们的文学血脉里，也支配着人们的文学行为与文学意识，当然也遮蔽了大量丰富而又复杂的十七年小说现状。因此，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去蔽”就自然成为我今天研究十七年小说的迫切任务。通过“去蔽”，在十七年大量而又复杂的文学事实里关注细节，从而给历史以鲜活，还文学以丰沛，以靠近真实的十七年小说。所以，写作中将不会论述那些已经被经典化了的以“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为代表的宏大历史叙事的小说，而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一些已有的研究

① 李杨：《当代文学史写作——原则、方法与可能性》，《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

② 戴逸：《关注历史细节》，《中华读书周报》2001年2月14日。

关注较少的小说上。

通过对这些个体与生命意义细节的关注，我们会发现，十七年小说因这种关注而变得不再那么的枯燥与单调，这些个体与生命的意义细节赋予了十七年小说摇曳的丰姿，因而也能更长久地吸引我们的关注。

当前诸多的文学研究关注的是十七年文学的主流，而忽视了十七年文学的见证者、参与者的思想历程与个体细节。我们应该抛开宏大历史叙述进入历史细节，以个体生命的具体记忆方式来见证历史，抗争抽象对记忆的遗忘。马尔库塞认为，艺术“不管是否被仪式化，艺术都包含着否定的合理性。在其先进的立场上，它是大拒绝——抗议现实的东西。人和万物得以表现、歌唱和言谈的方式，是拒绝、破坏并重建它们实际生存的方式”^①，对于十七年小说我们也应做如是观。正因为它是大历史中的细微折射，透过它反射出革命、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等一系列时代重大问题，对于它的剖析和解读在今天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旦我们从细节进入，就会发现十七年小说文本内在蕴含众多时代话语冲突，小说文本成为话语之间相互碰撞与纠缠的冲突场所。

在研究方法上，刻意让自己的研究参照法国当代伟大哲学家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谱系学”的研究方法，不去通过研究试图还原十七年小说未被污染的、原始的历史，而是通过研究十七年小说的知识建构过程，分析其话语建构背后的权力运作方式。在福柯看来，我们只能对人类的认识史做考古学的研究，探究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即支配我们思想和话语实践的被组装起来的各种规则是什么。知识考古学“推迟了各种认识的不确定并合，打破了这些认识的缓慢的成熟过程，迫使它们进入一个崭新的时空，把这些认识从它们的经验论的根源和它们原始的动机中截取下来，把它们从它们的虚构的同谋关系中澄清出来，因而它们在历史分析中就不再意味着追寻静默的起始，无限地上溯最早的征兆，而是意味着测定合理性的新形式以及它的各种不同的效果”^②。通过“知识考古学”与“谱系学”的研究方法，试图在十七年小说研究中“颠覆史料与解释之间的那种

① [法]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张峰、吕世平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

②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页。

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关系”^①。当然，正如洪子诚所警惕的，“我在《文学史》中讲到的对价值判断的搁置与抑制，并不是说历史叙述可以完全离开价值尺度，而是针对那种‘将创作与文学问题从特定的历史情景中抽出来，按照编写者所信奉的价值尺度作出臧否’的方式”^②，这也是本书写作的过程中时刻提醒自己要警惕的。

在十七年小说研究中，长期以来的社会历史政治注脚式研究让小说成为社会历史政治的见证与注解，丧失了文学独立存在的意义。这是十七年小说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症结，也是福柯意义上研究者“缺乏思考他者能力的表露”^③。在进入十七年小说研究领域时，研究者应该对此报以足够的警惕。

“批评也是一种心灵的事业，它挖掘人类精神的内面，同时也关切生命丰富的情状和道德反省的勇气。真正的批评，是用一种生命体会另一种生命，用一个灵魂倾听另一个灵魂。假如抽离了生命的现场，批评只是一种知识生产或概念演绎，只是从批评对象中随意取证以完成对某种理论的膜拜，那它的死亡也就不值得同情了”^④。在研究中，我将力争用自己的生命体验作为历史的体察者，作为十七年小说的并肩者而站立，用自己的灵魂去用心倾听这些小说文本在当时的独特存在与言说，用心伴随这些小说文本重返它们的生命之旅，从而重建与这些小说文本的精神内在的紧密关联。这，或许就是十七年小说研究在当今社会中的现实意义之所在，也是我重新解读十七年小说的目的所在。

何伟亚将这种研究方式称为“介入往昔”：“重构过去不仅仅是简单的发掘新证据、运用新方法，或揭露以前的偏见。它也意味着主动介入所有学术研究都要卷入的知识的产生与传布的政治之中”^⑤。同样，福柯对历史的知识谱系学分析，恰恰源于现实的冲动：“我起初是从一个用当代术语表述的问题出发，我想弄清它的谱系。谱系意味着我的分析是从现实的问题出发的”^⑥。这种“介入往昔”与“对现实发言”的辩证，正是我所努力的意义所在。

① [美]何伟亚：《怀柔远人——玛噶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② 李杨、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文学评论》2002年3期。

③ 《权利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

④ 谢有顺：《文学批评的现状及其可能》，《文艺争鸣》2009年第2期。

⑤ [美]何伟亚：《怀柔远人——玛噶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9页。

⑥ 杜小真编：《福柯集》，王简译，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635页。